

《臺灣社會學刊》第 67 期  
2020 年 6 月·頁 237-246 【論壇】  
10.6786/TJS.202006\_(67).0008

# 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

陳嘉新

237

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

---

陳嘉新(✉)

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

通訊地址：112304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

E-mail: jschen1973@ym.edu.tw



# Biopolitics of a Pan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

**Jia-shin Chen**

Institute of Science, Technology, and Society,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.

COVID-19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國通報第一個案例之後，截至本文完稿時間（2020/05/09），全球個案數已經逼近四百萬，來勢洶洶，迄今仍無終止之勢。目前此感染症仍無有效療方，也沒有疫苗可以注射預防，因此各國針對可能感染者的因應之道，還是處理傳染病的傳統作法，也就是偵測可能的案例、隔離已確認的患者、並提供支持療法等等；至於針對未感染的一般民眾，則是強調呼吸道感染的普遍防護（universal precaution），也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以及維持社交距離。

在我另外一篇討論 COVID-19 的短文（陳嘉新 2020）裡，我把這些措施歸結為「人群的擺放」，也就是如何安置以及部署人群，以達成最大的防疫效益。這些措施隨著防疫相關的資訊通訊科技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）發展，也產生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操作模式。例如，在群體面向上，我們可以看到假日期間對於觀光景點的熱點控管，在 1968 App 上面提供目前該景點的人潮擁擠程度，以供出遊民眾參考。在個人面向上，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與澳洲等國推廣以藍芽為基礎的手機程式，方便追蹤與記錄個人行蹤，也可追溯是否與確診者有過近距離接觸（Kelly 2020）。這種方式會比臺灣目前採用的 GPS 定位為基礎的警訊發送更為精確。至於非關科技的維持社交距離（social distancing）措施，包括提醒室內外保持若干人際距離或避免大型聚會，則可看成防疫的社會技術（social technologies）。

某些學者認為維持社交距離這種說法不夠好，改成維持身體距離（physical distancing）比較正確。多倫多大學的研究者 Jeff Kwong 表示：「這概念指的是身體上的分離，社會面向上我們還是需要結合在一起，只是以虛擬的方式。」（Hensley 2020）儘管依照 Google Trends 搜查，過去三個月內 social distancing 比 physical distancing 的網路出現率仍高出甚多，但美國疾病管制局的網站也已加註「維持社會距離，也叫做維持身體距離……」

(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20)。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 Eric Klinenberg (2020) 在紐約時報的投書中提醒：維持社交距離還不夠，我們還需要社會團結 (social solidarity)。他建議一些措施：列出可以接觸脆弱鄰居的在地志工名單；提供老弱者的陪伴，並幫助他們訂購食物與藥物；招募青少年或大學生來教老人數位溝通技術，讓他們能夠跟遠方的親戚交流；請年輕人幫那些無法購物的人買雜物；打電話給鄰近的遊民收容所，問問他們是否需要甚麼協助。這些建議提示我們，加大身體距離固然可能提供個體免於疫病的安全感，但也可能進一步破壞早已淡薄的社會信任與團結感。換句話說，所謂人群的擺放要如何跟社會距離與社會團結兩個目標調和，需要政府與人民的相互合作，這也是防疫時期的生命政治 (biopolitics) 重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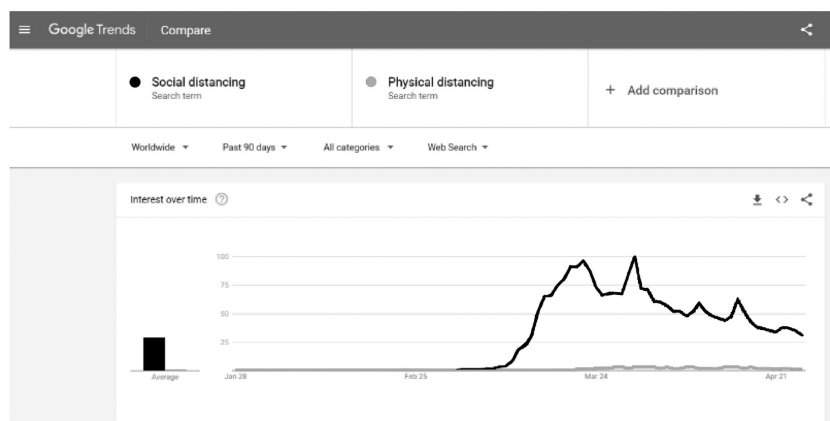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利用 Google Trends 搜查過去三個月全球使用 Social Distancing (深色曲線) 與 Physical Distancing (淺色曲線) 的使用比較 (取用日期：2020 年 4 月 28 日)。

由處處可見的「防疫如同作戰」的口號中，我聯想到戰爭、社會與生命政治之間的關連。傅柯 (Michel Foucault) 在 1975-1976 年的法蘭西學院演講〈必須保衛社會〉(Society Must Be Defended) 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概念與論點，幫助我們思考當前臺

灣如何在拉大的人際距離中鞏固且強化了共享的社會感，同時又構成了怎樣的生命政治樣貌。

傅柯在摘要這系列演講時表示，這一年的主題在於「戰爭如何被用來分析歷史或更廣泛的社會關係」（Foucault 2003: 270）。他指出此一命題中所謂的戰爭，指的是種族戰爭（race war）（Ibid.: 60）。種族這概念常以生物學的方式進行人群的區隔，因而產生高貴與野蠻民族之間的差別，且依此正當化殖民宰制的理由。

傅柯在演講中發展這個論點。他描述種族主義與國家形成的糾結關係，並在最後一講（1976年3月17日）提出國家種族主義（State racism）以及生命權力（biopower）的概念，在此他將種族主義定義為「在權力控制之下的生命領域，引入一種切割斷裂的方法：這個斷裂區隔出什麼必須活，什麼必須死」（Ibid.: 254）。這正是生命權力的展現：將生物性（the biological）當成權力控制的對象，引入也轉化戰爭關係，讓那些必須排除乃至於死亡的生命被當成是社會的「威脅」，排除他們變成保全群眾生命的手段。同時，一個正常化／規範化的社會（normalizing society）也逐漸成形，將生命樣貌切割斷裂的方式會成為規範／正常（norm）的判準，且產生了禁制與排除的效應，因而又回到了種族主義的操作。傅柯因而提醒說「種族主義是殺戮的前提」（Ibid.: 256），此處所謂的殺戮並不侷限於單純的謀殺，也包括每一種間接的致死手段，包括增加其死亡風險、排除機會、拒絕求生可能等等。這樣的生命權力走到偶發的極致，就會出現納粹的種族大屠殺。

這些演講發生在傅柯發展他有名的權力觀點的那幾年，所以要看到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的相關討論出現並不令人意外，但這套生命政治與權力的運作對照於此時此地，還頗為相互呼應。臺

灣經由個體的規訓（洗手、口罩、維持社交距離）到集體的生命政治（流行病相關的機構與人員管制、掌控並疏導群眾活動），呈現了生命權力由政府到民間的多面向且毛細管式的分布型態。臺灣群眾在這種防禦（國境的與個人身體的）冠狀病毒時，也同時捍衛著種族主義所需的生物性斷裂：感染的與未感染的、汙染的與純淨的、我族的與他者的、防疫成功的與疫情失控的。這種斷裂有時炒熱了原本的兩岸對立與國族主義，變成臺灣民眾對於台商（或者中國）的矛盾情緒；有時放大了防範威脅的風險感知，便形成對感染者乃至於居家隔離等高風險族群的獵巫行徑。

近日，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一篇短論中回顧自己的臺灣研究。他從上世紀八〇年代起觀察臺灣選舉現象，認為臺灣過去以一系列選舉構築起來的「選舉共同體」，仍難以改變臺灣命運由外部力量決定的狀態。但在他眼中，當前臺灣「『選舉共同體』的成員們，正在展演稱為『防疫共同體』的人民主權。參與以臺灣為單位的防疫陣線，透過守護共同體的經驗，或許這個『防疫共同體』正是某種『生命共同體』（李登輝在1990年代初曾經使用過的詞彙）的體現。」

對照傅柯的前述演講，我們可以說防疫共同體是生命政治與權力的效應。對外，臺灣民眾的主體意識更形凝聚，這反映在一系列為臺灣正名或者爭取臺灣重入國際組織的行動。對內，為了維護這個共同體的持續存在，臺灣也對可能的威脅更為提防。臺灣人民在對政府的防疫措施表達高滿意度的同時，也進入一個無時不在戰爭狀態的防備（preparedness）。傅柯曾經在演講中形容這種集體意識：「我們必須防衛社會，以免於我們創造出來的其他種族（race）、次種族（subrace）、或是反種族（counterrace）所帶來的生物性威脅。」（Foucault, 2003: 61-62）但是這種態度也可能出現生物權力的負面效益，包括疏於思考我們要保衛的到底是哪種「社會」，國家是否盤據了社會的自主空間，或者個人

為此防疫共同體讓渡多少的自由與權利。

執筆本文前數日，報端揭露了某殺警案的無罪判決。輿論再次分裂成兩派：一派要求重懲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殺人者，並且連帶地將實施精神鑑定的醫師也納入撻伐，認為是脫罪的主因；另一派則呼籲尊重司法中立，並強調不要加重精神病人既有的污名效應。這件事情看似與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無關，但兩件事都出自於「必須保衛社會」的防禦機制。筆者並不擬抱持命定論的悲觀，認為排斥罹病（肺炎或者精神病）是形成社會性的必然條件。但是值得思考的是，如果社會團結是我們的應許之地，我們也得捫心自問，團結是否建立在某種排他性之上，而那個排他的分界線要如何刻畫？最後，容我再套句傅柯的話語：「我的重點並不是所有事物都是壞的，而是說所有事物都是危險的。」（Foucault 1983）隨時保持著這種心態，我們才能不被生命共同體的熱情與滿足沖昏頭，而能保有活動、抗議、改造的能力。



## 參考書目

- 若林正丈，2020，〈我的臺灣研究人生：選舉共同體與防疫共同體——從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到新型冠狀病毒時代的臺灣政治腳步〉。取用網址：<https://reurl.cc/r8avNk>，取用日期：2020年4月28日。
- (Wakabayashi, Masahiro, 2020, *wo de taiwan yanjiu rensheng: xuanju gongtongti yu fangyi gongtongti — cong 1983 nian zeng e liwei xuanju dao xinxing guanzhuangbingdu shidai de taiwan zhengzhi jiaobu.*)
- 陳嘉新，2020，〈由 COVID-19 看全球衛生治理〉。《科技、醫療與社會》30: 257-265。
- (Chen, Jia-shin, 2020, *you covid-19 kan quanqiu weisheng zhili* [Examin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Midst of COVID-19]. *Kejiyiliaoyushehui* [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Medicine] 30: 257-265.)
-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, 2020, “Social Distancing, Quarantine, and Isolation.”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reurl.cc/q8mnmmy>. Retrieval date: April 28th 2020.
- Foucault, Michel, 1983, “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: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.” in Hubert L.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(eds.), *Michel Foucault: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*, 2nd ed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Foucault, Michel, 2003, *Society Must Be Defended.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, 1975-1976*. New York City: Picador.
- Hensley, Laura, 2020, “Social Distancing Is Out, Physical Distancing Is In—Here’s How to Do It.”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reurl.cc/5qoDkn>. Retrieval date: April 28th 2020.
- Kelly, Linda, 2020, “Australia launches controversial COVID-19 tracking app as some states start easing rules.”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reurl.cc/Ld05d4>. Retrieval date: May 4th 2020.

Klinenberg, Eric, 2020, “We Need Social Solidarity, Not Just Social Distancing.” New York Times.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reurl.cc/n0nqVd>. Retrieval date: April 28th 2020.